

19.07

平遠文史

第二輯



87

平遠縣政協文史資料編輯委員會編

111/28/11

平远文史

第二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平远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编辑委员会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

目 录

林公顿传略·····	丘德贵、吴浩、张信华 (1)
回忆父亲·····	林纪曾 (9)
抗日烈士杨运洪·····	史 朗 (13)
冯克定烈士生平事略·····	毅 力 (16)
韩祝三传略·····	丘文衍 (19)
中国国民党平远县党部成立之经过 ·····	吴 浩、张志平 (21)
民国时期平远县历任县长 (民政长、知事) 名录 ·····	肖瑞锡 (27)
有关平远县的议会、参议会、参议员的史料 ·····	冯扬德、宋尚晋 (30)
平远县的三青团史料·····	姚尹修 (35)
回忆《平远民报》·····	谢岑凤 (37)
民国时期平远县的粮食征收情况 ·····	《平远县粮食志》编写组 (41)
抗日战争最后阶段, 广东省政府迁到平远的史料 ·····	秦庆钧 (47)
省府迁到平远时, 各机关的办公地址·····	本刊整理 (52)
<u>天主教、基督教在平远的传播</u> ·····	冯扬德 (54)
<u>平远修志简史</u> ·····	刘集贵 (57)
√ 赖伴梅女士的挽夫联·····	林 秀 (61)

林公顿传略

丘德贵 吴浩 张信华

林公顿，原名林振龄，1899年生于平远县东石乡上凉庭村。1924年，他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解放前，曾任平远县教育局长、国民党平远县党部执委、始兴县长、军队少校秘书、中校咨议、平远县长等职。1949年2月以后，积极参与策动国民党平远县军政警人员起义，对和平解放平远作出了贡献。解放后，任平远县军事管制委员会顾问、平远县人民民主政府副县长、兴梅地区行署民政科副科长等职务。1957年3月，因患脑溢血病故，时年58岁。

林公顿，出身于世代书香家庭，他的曾祖父是秀才，祖父是拔贡，父亲林商翼和叔父林震也是秀才。他的家从其曾祖父开始，就望重乡里。他的曾祖父，毕生教书。祖父以“居仁由仪”的正绅面目出现在当时的社会里。父亲林商翼，字鲁传，是一个年轻的秀才，苦读过《原富》、《天演论》、《社会通鉴》等书，曾就读两广师范传习所。毕业后，回到家乡积极创办“西学堂”，是平远旧制学校的创始人之一。清宣统元年己酉岁(1909年)，被选为广东省咨议局平远议员。民国元年一月，广东省成立临时省议会，议员改称代议士，省属每县一人，林商翼又被选为平远县代议士。民国八年三月，再次

当选为平远代议士。

姑母林寅存，是清末较早去日本学医的留学生。曾参加同盟会，北伐期间在北伐军当护士，后来当了医生。她未生育子女，就以公顿家为家，是公顿兄妹读大学的主要支持者。

叔父林震，字叔慧，别名宿慧。清末就进了陆军学校，也是同盟会成员。辛亥革命后，曾任国民党陆军二十二师师长、广东北伐军的前敌指挥。

妹妹林玮，北京读书毕业后，先在北京后去南洋教书，一生未婚，对公顿的家庭在经济上有所支持。

解放前，林公顿家有九亩多水田，一块果园，家庭经济来源主要依靠农母和他自己的薪金。公顿生有三男四女。他与妻子李燕佳(家庭妇女)皆信奉基督教。

林公顿，幼年好学，好强，乡人称他为“蛮顿”。童年就读于本乡为文小学堂，与曾养甫同学，年岁相若。1917年毕业于平远旧制中学。次年，考进北京大学数学系，后转读经济系。1919年，林公顿参加了“五四”运动，被反动军警逮捕。释放后，曾受特务的短期监视。后来，在姑母的温情劝告下，没有再参加学生会。其时，因受黄炎培、陶行知“教育救国”思想的影响，便到平民夜校兼任业余教员，直至大学毕业。“五四”运动前后，他曾认真阅读《新青年》、《新潮》、《晨报》副刊、《丝语》等进步报刊，还阅读了《大众哲学》、《通俗经济学》、《社会进化论》等著作，对他的思想起了很大的影响。

1924年6月，林公顿大学毕业后，叔父和父亲在几个月内相继病故，家中却还有年老的祖母。在此情况下，公顿只

好回到家乡维持家庭，侍奉祖母。一年后，祖母离世，公顿有了出去做事的念头。1925年6月，经人介绍出任平远县教育局长，同时加入国民党，并兼任国民党平远县党部执委。一年后，公顿辞去了教育局长，于1926年3月去广州，因叔父的关系，找到当时掌握广东政权的李济深(曾是其叔父林震的部属)，李济深以熟悉情况为由，委派公顿任平远县长。

1928年12月，李济深被国民党扣押汤山，公顿也在1929年6月卸了平远县长职。接着，通过陈济棠部军长黄延楨的关系，在该军63师当了少校秘书，服务于249团。1930年5月，通过黄延楨的介召做了始兴县县长。过了一年多，又去陈济棠部当了两年的中校咨议。1934年，再次出任平远县长，直至1938年。他在任职长达五年期间，曾在绅士中主张“公”“正义”、“循理守法”。在农民中宣传“安分守己”、“奉公守法”。他曾发布《禁烟、禁赌、禁酿和禁止高利贷》的文告。文告发布后，他执法严明，一个违反文告的高利贷者被抓去坐牢，还关押了一些吸食鸦片的人。他曾在全县160多个保中，设立“义仓”，为贫民百姓备荒(仓谷由当地公尝田租和富户捐出)。在任职期间，设立了平远三等邮局，修筑了关(关上)柘(大柘)公路和东铺(新铺)公路平远段(即中村至坝头公路)；全县设立了四个苗圃场，面积八十亩，育苗一十一万多株；1936年，平远遭受水患，损失40多万元。公顿立即向省请赈救灾，以减轻灾民困难。他整顿了学校，教育事业有新发展。

1938年9月，林公顿突然接省命令，免除平远县长，“调省府任职”。公顿接到命令后，感触甚深，深感国民党

内部你虞我诈，仕途险恶，从政思想从此消极下来。于是，决定不去省府赴任，毅然回家隐居。从此，他在家乡过了七年之久的绅士生活。家居期间，他兼任了铁民中学（今东石中学）董事长。直至1946年3月以后，他才先后挂了广东省党政训练所主任、省党务视察、第六区党务监察专员、湘南煤矿局专员、省参议员等“官衔”，但实际上还是家居为多，只是领一份官薪而已。

1947年初，全国解放战争迅速发展。林公顿通过经常阅读香港《大公报》，对国内时局有所了解，但他寓于平远偏僻山区，对全国的形势还不清楚。他为了观察迅速变化的时局，在年初便离开了隐居多年的老家，到南京、上海、湖南、广州等地，广泛接触各界故旧和进步人士，时间长达两年之久。这两年的所见所闻，给公顿很大的教育和鼓舞，他看到国民党大势已去，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蓬勃发展。

1949年春节前，他在广州找到了李济深，并由他介绍去香港找到了民革华南负责人张文。在张文的鼓励和支持下，他作出了回平远去做和平解放运动工作的决定。1949年2月，他带着《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论联合政府》等毛泽东著作和《共产主义问答》小册子回到了平远东石。

林公顿回到家乡，就有武工队员前来与他秘密联系。他以自己的社会地位为掩护，在家里与武工队开展联络。武工队来到后，吃的、住的和保密问题都由他的妻子李燕桂负责办理，还采取了一些安全措施，动员亲房各户养的狗都杀掉，使武工队人员进出不致暴露目标。林公顿回到家乡后几天，活动在公顿家乡一带的梅平武工队人员赖济庭、赖济

泉、叶萌、陈广生，便主动直往他家。在接触中，对林公顿说明了当前的形势，并向他要枪支和借阅香港带回的小册子，林公顿都办到了。

经常在离公顿家十几里远的锅孟里(地名)活动的另一支武工队——梅北武工队，把与公顿接触列在议事日程上。公顿回来十几天后，就通过当地群众林宜曾，约定了接触的时间和地点。接着，由武工队指导员马添荣等带领队员郑程到林公顿家，受到了热情接待，并安排在他家附近的学校里食宿。公顿向共产党领导的武工队表示了投靠革命的决心，武工队离开时，将家藏的几支驳壳枪和一千多发子弹主动交给武工队。

梅平武工队为了争取时间，对林公顿做好统战工作，于1949年3月又由武工队负责人直接出面与林公顿联系。6日，队长陈玉堂带领陈玉湘先找到林公顿的前部属凌卫杰，请他向林公顿转告武工队的意图。3月10日，凌卫杰向武工队转达了林公顿的回答，明朗表示积极支持梅平武工队的活动，并约定3月13日到东石圩林家祠会晤。因为他们互不相识，又商定林公顿以身上穿长衫套马挂为标记。13日那天，陈玉堂、陈玉湘按预定的地点与林公顿接触。会晤时，林公顿对武工队提出的要求表示尽力而为，还说为了不出事故，以后直接到他家里联系。3月23日，陈玉堂、陈玉湘由篾匠师傅陈玉钱(家名观音妹，是陈玉堂的哥哥)引路，直到东石凉庭林公顿家里，要求解决一批枪支弹药。林公顿爽快地说：

“我有一支自己用的驳壳枪，子弹三百发，可先交给你们使用”。当晚，他把驳壳枪交给了陈玉堂，并说：“枪套子不方便带，暂时留下，以后交篾匠师傅带给你们”。陈玉堂提

出林姓自治会的枪支时，林公顿说：“林姓自治会有九支^新驳壳枪，由各房头保管，我会与各房头商量，借给你们使用”。不久，由陈玉堂带领陈玉湘、姚铁汉、李星朗、卓达、陈亚桂等到林公顿家顺利地取出了九支驳壳枪、两千七百发子弹，上交独四大队。随后，林公顿又协助梅平武工队策动国民党东石乡公所和乡自卫队共交出驳壳枪十九支，先后介绍一部份青年参加武工队。

林公顿与武工队联系，开展革命活动的情况，被平远县长黄纯仁觉察，怀疑公顿是受威胁还是真的“变”了。因此，县政府和国民党县党部商量对付林公顿。这时，有人劝公顿离开平远，但公顿说：“沾点革命气味都有三分危险的”（引自林公顿自传）。林公顿没有走，便假装受游击队威胁，托人向县长黄纯仁要求给个名义，移住县城。果然，黄纯仁给公顿做“高级顾问”，以为这样可以利用他、软禁他，控制其活动。武工队也认为林公顿移住县城能更好地开展工作，便支持他去任顾问职。这样，林公顿到了县城（仁居），住在林家祠。他住在县城，经常工作到深夜，采取各种方式，对县长黄纯仁、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陈楷、警察局长严若寰，做了多次和平解放平远的劝说工作。严若寰曾是林公顿的老部下，两人关系密切，公顿多次到他家中秘密商谈，耐心劝说，终于说服了严若寰。这时，林公顿便秘密向国民党兴梅专员李洁之表示，决心和国民党决裂，拥护共产党，走和平民主道路。

林公顿住在县城期间，曾挺身而出掩护和保释多名被捕的地下工作人员。武工队人员赖济庭被捕后，林公顿千方百计出面保释，因迟了一步，保释没有成功。地下工作人员陈

彪在肭舌里被捕，林公顿找到黄纯仁要求不要杀陈彪，结果免杀，关押在仁居监狱里。蕉岭地下县委通过林公顿与陈彪取得了联系，鼓励他保重身体，坚持斗争（陈彪在1949年5月22日，平远和平解放时出狱，即任四团警卫连指导员）。

1949年初，全国解放战争节节胜利。5月间，五华、兴宁、蕉岭等县相继解放。5月21日，闽粤赣边纵第一支队二团、四团部队从梅县出发进军东石，包围了驻在东石建泉祠的国民党平远县保安营第三连。连长冯冠雄，因事先受林公顿的劝说和警察局长严若寰的暗示，已有起义准备。此时，林公顿只身来到建泉祠向冯冠雄喊话，使他率部起义，不费一枪一弹，和平解放了东石。22日，林公顿随同二团、四团部队进军平远县城（仁居）。黄纯仁、陈楷和保安营第二、三连及独立排，于5月21日慌忙向黄畲撤退，而严若寰则巧妙地另择道路，率部一百多人向六吉（地名）方向撤离。22日晨即率部返回县城起义，同样不费一枪一弹，和平解放了平远县城。在二团、四团部队举行进城仪式中，林公顿与陈悦文、陈玉堂等走在队伍的最前面。由于他对和平解放平远作出了一定贡献，被委任为平远县军事管制委员会顾问。6月21日平远县人民民主政府成立，中共梅县地委任命林公顿为副县长。

1949年7月4日，国民党胡璉兵团残部南逃窜扰县城仁居，林公顿与县军管会、县府人员及保卫人员八、九十人撤到东石的铁民中学（现东石中学）。7月5日晚，胡璉兵从仁居追到东石，首先包围了铁民中学。县府人员及保卫排撤退时，公顿跌伤了脚，无法再走，便叫其他人员迅速撤

退。林公顿一人克服了诸多困难，先后转移到东石丰大堂、麻塘里、割藤窝和洒水的上碌子一带，与特务周旋了约两个月，在老赤卫队员林文三的保卫和照顾下，终于摆脱了特务的追杀。那时胡璉兵到处放出风声叫林公顿出去“自新”。公顿听后说：“放屁！林公顿已投身革命，就不会无耻地向敌人自新”。事后，他曾对人说：“如果当时敌务仍追上来，我就用身上的枪与他们拼，拼不赢就用最后一粒子弹牺牲自己，决不让敌人捉去”。胡璉兵进占平远期间，到处搜捕林公顿的家属。其妻李燕桂与子女分散避难，历尽艰辛，辗转于揭西里、梅子畲、斗米石等山区，在战士和群众的掩护下，全家大小才幸免于难，但与林公顿有关的大、小三座房屋及家物财产全部被胡璉兵烧毁。香港《建国日报》民国38年（1949年）7月21日报道：“林公顿……因参加投附共匪，经广东省监察委员会查悉，决议永远开除党籍”。该报于7月23日又报道：“省参议员林公顿附逆，民厅已请示内政部如何处置云云。顷据民厅发言人称，……应予除名……。省政府业已根据事项令电飭该县依法改选，并报请内政部备案……”。

1949年9月1日，胡璉兵团残部南逃，县军管会、县府迁回县城办公，林公顿继续任平远县副县长。1950年3月任兴梅行署民政科副科长。1957年3月病故。

回 忆 父 亲

林 纪 曾

先父林公顿，经历了五十八个风云变幻的春秋，于一九五七年三月患脑溢血辞世。

我幼时听父亲说过，早在辛亥革命之时，年仅十二岁的他，受到具有民主革命思想的三叔林震（又名林叔慧，同盟会成员）和父亲林鲁传的影响，邀集一班热血少年，手持剪刀，到处去剪清末遗老遗少的辫子，第一次接受了社会变革的洗礼。

一九一八年，他就读于中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那里人才荟萃，新学如潮，思想活跃，使他有机会接触到许多先进人物和进步思想。当时，正值军阀横行，汉奸肆虐，他以一个血气方刚的青年，激愤于生灵涂炭、国是日非的景况，成了一九一九年爆发的“五四”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小时曾听他忆述当时的情况：他是“五四”爱国运动的中坚力量，北京大学学生的骨干分子，四出串连各校学生，秘密组织各种活动，上街示威游行，走在队伍前列，在木棍、水龙之下，与反动军警搏斗。他还勇敢地爬墙闯入曹宅，打开大门，让青年学生冲进大院，痛打了卖国贼。于是，他成了被捕的学生之一。事后，在北大校长蔡元培等人的多方营救下才得以出狱。后来，由于来自社会、家庭及旧意识等诸多因

素的影响，未能继续站在社会变革的前沿。然而，“五四”运动对他的影响毕竟是十分深刻的，使他丰富了阅历，增长了知识，开拓了眼界，这种影响若隐若现地存在于他曲折的一生之中，并最终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五四”运动后期，他曾醉心于“教育救国”的理想，兼任“平民夜校”教员，试图以此唤醒民众。大学毕业进入社会以后，又寄希望于早期的国民政府能够施行“仁政”、

“法治”，以救民于水火，致国于富强。可惜，这些幻想却在残酷的现实中一一破灭了。所幸的是在那污浊环境里挣扎的过程中，他保持了正直为人的品德和救国救民的良知。在他从政于国民党政府期间，仍然为人民办了不少好事。

他两次任平远县长期间，宣传“廉洁正直”、“公理正义”，而且禁烟、禁赌、禁止高利贷等，打击社会公害。与此同时，还提倡教育，推广技术，发展生产，设立“义仓”，救济贫困，取得一定的政绩。平远地处边隅，交通闭塞，他主持修筑平远通往蕉岭新铺、大柘至关上等公路。由于修建公路须占用一些农田，遭到田主们和一些保守势力的激烈反对，障碍重重。他深知发展交通对经济、文化开发的重要，乃力排众议，亲自督办。经过艰苦努力，终于完成了这一造福子孙后代的艰巨工程。我小时候，曾看到一张他和部属在东石冷水坑龙头凹考察时的照片，他曾把在龙头凹建立水利设施，消除东石旱患作为自己的心愿，并为此上呈省府，到处奔走。可惜当时的省府不予置理，未能成事。解放前后，他每每谈及此事，感到十分惋惜。

父亲为官清正。据母亲回忆，在他出任始兴县长不久，由于公断了一宗前两任县长均未能解决的冤案，当事人十分

感激。事后，私下送来十多两黄金表示酬谢，父亲断然拒绝，并婉言教育。一九三八年，他出任了长达五年的平远县长之后，刚刚调任回乡，却经济拮据，只好函请在马来亚任教的妹妹林玮，汇来数百元接济，被亲朋传为笑谈。他为官多年，不治家产。在任县长期间，每月给母亲的家用钱，母亲都节省下一部份，后来买了四、五亩水田。直至解放，包括祖上遗产在内，仅有水田九亩和果园一块。

父亲在国民党军政界涉足多年，深感政治上日趋腐败，你虞我诈，前途无望，乃于一九三八年断然拒绝省府调令，回家隐居。一九四七年，解放力量空前壮大，革命形势迅猛发展，他虽身居偏僻的边隅，但通过阅读香港《大公报》的报道，却透过黑幕，看到了中华民族解放的曙光。于是，他毅然离家外出，到各地观察革命形势，从此思想豁然开朗，精神为之振奋。回到平远后，便与游击队取得联系，地下党要求他帮助做策反工作，他欣然承诺，不避危险，深入虎穴，凛然无惧。胡璉兵团残部窜扰平远时，他与政府工作人员一齐撤退，并参加了铁民中学一役的战斗。由于在行军中跌伤了脚，几经危境，险落敌手，在群众大力掩护之下，才幸免于难。敌人不断放风，诱其“自新”，他坚定自若。在此期间，家人株连，四处逃亡，饱经忧患；房屋被焚，家物尽毁，父亲义无反顾，没有丝毫的后悔与叹惜。胡璉兵团败逃，平远重获解放，家人幸存，得以团聚，只得借居几间古旧房屋。亲朋乡里感其为革命而毁家，发起集资，重建被烧毁之房屋，父亲婉言谢绝了。事后他曾说过：“回首前半生，无功于人民，常感内疚，这次也算还了一点心意”。值得一提的是，在父亲参加革命活动的过程中，始终得到母亲

李燕桂的充分理解和支持，协助父亲做了不少工作。

解放后，父亲以崭新的面貌成了革命政府中的一员，头戴五星帽，脚踏解放鞋，精神焕发，老当益壮，为新政权建设付出了辛勤的劳动。我清楚地记得，有一次，他因公出差顺道回家，曾对我说：“爸爸在旧社会生活了几十年，需要经过长期的考验才能成为真正的共产党人，如果将来你能成为一个共产党员，那是我最高兴的事情。”这充分反映了他对中国共产党的热爱和对新中国美好前景的向往。一九五二年土改后期，我有机会和他见面，又对我说：“我相信共产党一定能领导好中国，你也会有光明的前途……”。还鼓励我追求进步，努力向上。一九五六年，我考上北京大学物理专业，他以十分兴奋的心情寄来一张明信片，信中说：“欣闻你考上北大物理（系），高兴得夜不成寐，我也是老北大啊！我一定努力改造思想，也望你戒骄戒躁，并以天下为己任，做毛主席的‘三好’学生”。不幸，次年他便与世长辞了。

新中国经过风雨泥泞的艰苦历程以后，已经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新的起点，开辟了一条通向繁荣富强的康庄大道。父亲遗下的六个儿女，已在新中国的怀抱里成长，都在为祖国的建设而努力。母亲年近八旬，依然健在，正安享晚年。国事兴旺，家事相和，父亲有知，定当笑慰于九泉。父亲，安息吧！

（作者是广东省地震局研究员）

抗日烈士 杨运洪

史 朗

杨运洪营长在伟大的抗日战争中，为抗击日寇侵略，挽救国家危亡，英勇杀敌，壮烈牺牲。经广东省人民政府批准为抗日烈士，为平远人民谱写了光辉史页。

杨运洪，广东省平远县黄畚乡人，一九一五年生。杨自幼聪颖过人，读小学、初中时，学习成绩优良，操行甲等，老师喜爱，同学友好，乡里赞誉。一九三二年秋，杨在初中毕业后，即被乡里小学聘为教师。“九·一八”事变，东北沦丧，华北垂危；“一·二八”淞沪抗战，日本侵略者灭亡全中国的野心日甚一日。大好河山，面临蚕食鲸吞之祸；炎黄子孙，将遭奴役灭种之灾。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杨运洪目睹国家危难日深，决心投笔从戎，为保卫国家民族效力，毅然向学校提出辞职，于一九三四年远离家乡，考读南京陆军军官学校，为第十一期学生。过去初中时的同学，有的就读上海，有的就读广州，都为他读上军校而高兴，纷纷致函道贺。几次互通音讯之后，他以极其真诚恳切的态度，分别致函各地友好，函信往来，不宜过密，俾能更好地利用时间学好功课，练好本领，为国效力。杨之珍惜时间，勤奋好学，即此可见一斑。

一九三七年，日本侵略者挑起“七七”事变，燃起了妄图灭亡全中国的战火。军校当机立断，将第十一期学生提前毕业，立即奔赴战场，投入抗战。杨运洪编入第十一集团军七十一军三十六师一〇八团，历任排长、连长、营长，转战于江苏无锡和江西萍乡、樟树等地。一九四〇年在湖南长沙战斗中，身负重伤，送湖北阳楼洞医院治疗，不等伤愈，又请战上火线，转战于四川、西康。由于实现了投笔从戎抗日救国的心愿，杨营长在历次战斗中无不身先士卒，英勇杀敌，为官兵楷模，受上级奖誉。

一九四二年，日军五十五师团沿缅北密支那、畹町、龙芒公路进犯，滇西龙陵之敌越惠通桥强渡怒江，占据桥头，三十六师奋勇迎击，阻敌于怒江西岸，粉碎了日军会师昆明的企图。此后，三十六师与日军隔江对峙。一九四三年春，三十六军迁回怒江西岸，在桥头乡大塘子村附近山区与敌发生激烈的遭遇战，双方伤亡惨重。三十六师一面作战，一面撤退，杨营长奉命率部担任掩护，在全营官兵英勇阻击下，大部队得手安全撤退，而杨营长及其官兵全部壮烈牺牲，以身殉国。时在一九四三年十一月间，杨年二十八岁。缅怀先烈，使人大有“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之叹！

一九四四年春，远征军奉命反攻滇西，渡怒江，克腾冲，师长李志鹏派部属第三营璩云营长率部收集作战地区三十六师阵亡官兵骸骨一千五百多具，就地火化。杨营长骨灰罐葬于腾冲县南门外和顺乡的米凤山下农地上，筑了坟墓立了碑，还刻写了墓志铭，由张砺题志，宋绍椒建。建筑在西南关叠水河风景区的阵亡将士墓园也立有杨营长的墓碑。

杨营长和所有为国捐躯的将士们永垂不朽！